

论各民族文化相通*

——以中华民族共创共享的龙文化为例

孟靖朝

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，其中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。龙作为中国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符号，深受各民族的认同与尊崇，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，深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间的内在相通性。文章深入探讨龙文化体现各民族文化相通的四个核心维度，即共建族源神话、共创图腾崇拜、共享风俗习惯、共有价值观念。通过梳理各民族相关的龙文化现象，揭示龙文化在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文化的深度关联与和谐共融，以期为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持。

关键词：龙文化；中华民族；文化相通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作者孟靖朝，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助理研究员。地址：北京市，100094。

DOI:10.19683/j.cnki.mzlt.2025.03.004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：“各民族文化相通，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。”^①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大家庭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，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。文化具有传承精神、整合观念、凝聚共识的功能。共同的文化信仰能促使起源各异、文化多样的民族形成共同的精神追求，这种追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之一。

龙植根于中华文明起源之中，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。自古以来，龙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。远古时期，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有限，面对风雨雷电等强大而不可捉摸的自然现象，内心充满了敬畏。先民们构想出一种超自然的强大存在以掌控这些力量，龙的形象便应运而生。风调雨顺，归功于龙的庇佑；遭遇旱涝灾害，则归咎于触怒了神龙。于是，人们通过祭祀等活动来祈求龙的恩赐与宽恕。这种对龙的崇拜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。

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后，皇帝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需要至高无上的象征来彰显其权威和地位。龙，因其在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和强大力量，遂与皇权紧密相连，成为至高权力的化身。帝王自命为“真龙天子”，昭示其统治地位是上天授予的。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，使得龙与皇权的联系愈发紧密，历经多个朝代不断强化，至清代达到巅峰。清代，

*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“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研究”（2023YZD055）阶段成果。

① 习近平：《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9月28日。

龙被视为民族和国家的标志，以及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。入关前，八旗旗帜上便有龙的图案；清朝建立后，明确了黄龙旗的規制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国被卷入近代世界的发展浪潮，亟需一面能够代表民族和国家的旗帜。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，慈禧太后正式批准《北洋海军章程》，明确规定大清海军军旗“黄底蓝龙戏红珠图”为大清国旗。这一举措也凸显了龙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象征意义的官方地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龙进一步成为凝聚民族共识、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。《龙的传人》这首歌家喻户晓，“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”这句歌词，使得各族同胞在共通的符号与情感中找到归属感。新时代，龙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，是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精神旗帜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：“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，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、勇猛无畏的气概、福泽四海的情怀、强大无比的力量，既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，更承载着新时代新征程亿万中华儿女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意志和美好愿望。”^①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“龙”的重要论述，深刻阐释了龙的多重寓意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，并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，勉励“全国人民振奋龙马精神，以龙腾虎跃、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，开拓创新、拼搏奉献，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”^②。龙承载着新时代的民族精神，持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。

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动物作为象征符号之一。如美国以白头海雕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征。在美国国徽上，白头海雕振翅高飞，头顶的冠冕光芒闪耀，一只爪子紧握橄榄枝，象征和平，另一只爪子抓着利箭，代表战争的力量，生动地展现出美国在和平与武力间的权衡。俄罗斯的象征动物是棕熊，如 1980 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，官方吉祥物“米沙”便是一只棕熊。棕熊庞大的体型与俄罗斯广袤的国土相呼应，在俄罗斯文化中象征着力量、勇气与坚韧。此外，俄罗斯还长期以双头鹰作为国徽与官方象征。英国的象征动物是狮子。英国国徽的中心图案为一枚盾徽，盾面左上为三只红底金狮，象征英格兰，右上为一只黄底红狮，代表苏格兰，右下复现英格兰金狮纹章，可见狮子图案对英国的重要性。狮子也象征着英国人傲慢、强势的性格。法国的象征动物是高卢雄鸡，巴黎圣母院的屋顶、总统府邸爱丽舍宫的大门上，均有高卢雄鸡的身影。它代表着法国人民英勇坚毅的战斗精神，数百年来一直是法国的重要标志。

笔者认为，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，是各民族文化相通的重要体现。本文以龙文化为切入点，论证其通过族源神话、图腾崇拜、风俗习惯、价值观念四个维度，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推动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。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，其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，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和精神追求，也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共生。深入理解龙文化，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特征，增强民族凝聚力，增进中华文化认同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二、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建族源神话

古代的神话传说与神灵崇拜，是先民们认识民族起源与自然现象的重要载体。为解释自

^{①②} 习近平：《在二〇二四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24 年 2 月 9 日。

身起源、追溯祖先脉络，先民们创造了族源神话。在各民族创造的族源神话中，“龙”的身影屡见不鲜，许多民族更将龙视作本民族的起源，认为自己是“龙的传人”。同时，各民族普遍将龙视作神的化身。这些现象均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相通的内在联系。

（一）各民族将龙视作祖先

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语境中，普遍存在着将龙直接视为祖先的神话传说与文化记忆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就有“龙来氏羌”的记载，直接印证了龙与氏羌的关联；神话叙事中，鲧治水失败，死后“化为黄龙”，更将祖先直接视为龙；《山海经》亦载，“有人珥两青蛇，乘两龙”^①，通过“乘龙”意象强化了华夏先民与龙的亲近关系。除中原外，古代西域诸如焉耆、龟兹、于阗等地的族群亦普遍尊崇龙，自认为是河西走廊的“龙族”或“龙家”。焉耆人不仅视自身为龙的部落，更将龙作为姓氏。敦煌出土的文献载，“龙部落本焉耆人……其人轻锐，健斗战，皆禀皇化”^②，明确其族群与龙的渊源。《隋书》中亦记载，“焉耆国，都白山之南七十里，汉时旧国也”，并明确“其王姓龙”，^③印证了“龙姓”与王族的关联。龟兹的龙文化叙事则更具神话色彩。《大唐西域记》记载，龟兹“近代有王，号曰金花，政教明察，感龙驭乘”，其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，因“城中无井，取汲池水”，而“龙变为人，与诸妇会”，因此“人皆龙种”。^④于阗人则将龙奉为水神，“祠祭河龙”^⑤，并建有祭祀龙的祠堂。此外，匈奴亦有崇龙之俗，史载有“五月，大会龙城”^⑥“岁有三龙祠”^⑦等做法，“龙城”“龙祠”的设置，可见龙在其族群仪式与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。

还有些民族将龙作为民族起源的重要元素。在西南一些民族的创世传说中，枫树心孕育了蝴蝶妈妈，蝴蝶妈妈与水泡“游方”生下十二个蛋，经鹤宇鸟孵化，生出人类和万物，龙便是其中之一。在此体系中，龙与人类同出一源，既是生命起源和民族繁衍的重要象征，也寄托着这些民族对生命起源的神秘认知和对民族延续的精神向往。湘西苗族中，将优秀儿女喻为龙的化身，优秀的青年男子被称为“代春戎”（意为“龙后生”），优秀的青年女子则被称为“代帕戎”（意为“龙姑娘”）。^⑧这些日常称谓也直观体现了对龙的文化认同。还有一些民族的创世神话则将龙视为生存空间的开创者：天地初开时一片混沌，龙出现后搅动海水，使陆地逐渐形成，为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。因此，他们也自认为是龙的传人，龙在其族源神话中代表着创造和秩序，成为其民族认同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。此外，彝族《勒俄特依》、纳西族《东巴经》等民族文献中，均有龙的叙事，如纳西族有吟诵“祭龙经”的传统，生活在云南保山的布朗族也有“崇龙”传说和祭龙习俗等。可见，龙文化在少数民族信仰中也广泛存在。

将龙普遍视作祖先的文化叙事，不仅承载着各民族自我认知，更展现了龙文化在各民族族源神话构建中的独特作用与深远影响。各民族以龙承载族源认知、寄托精神向往。龙成

①《山海经》，周明初校注，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112页。

②陆庆夫：《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——龙部落迁徙考》，《敦煌研究》1997年第2期。

③[唐]魏徵等：《隋书》卷八三《西域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1851页。

④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董志翘译注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36页。

⑤《大唐西域记》，董志翘译注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第737页。

⑥[汉]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九四《匈奴传》，[唐]颜师古注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752页。

⑦[南朝宋]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八九《南匈奴列传》，[唐]李贤等注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2944页。

⑧过竹：《苗族神话研究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75页。

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联结。

（二）各民族将龙视作神的化身

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认知体系中，龙常被视作神灵的具象化呈现，可主宰自然秩序，在人们心中无所不能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，降水的多寡、日照的长短等自然天气的变化直接决定着农作物的收成丰歉，进而影响民生福祉和国家稳定。在此情况下，龙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，“古代人们往往把龙当作雷神、雨水神和虹神来崇拜，视之为雷电或雨水和虹的主宰者”^①。历代官方亦多次举办祭祀龙的仪式，如：唐玄宗曾下令建龙池，“开元二年闰二月诏，令祠龙池”，还将“仲春”日设置为固定的祭龙日期，“十六年，诏置坛及祠堂，每仲春将祭，则奏之”；唐德宗亦于“贞元六年六月，复祭五龙坛”。^②这些都从国家仪式层面强化了对龙神信仰的认同。

龙被视为雷神的化身，这在早期文献与诸多传说中均有明确体现。雷神具有龙的形状，这早在《山海经》中就有记载：“雷泽中有雷神，龙身而人头，鼓其腹。”^③一些民族将龙、蛇与雷电现象直接关联。如北方一些民族认为雷电源于龙，相传雷电之时，有民众目睹龙从天而降。东北一些民族同样将雷电当作龙的化身，认为闪电劈树就是龙形显现的征兆。将龙看作雷神，反映出民间对于龙的敬畏与崇拜。

龙亦被尊为雨水神的化身，被赋予调控降水的神圣职能，成为古人应对“靠天吃饭”的精神寄托。古人一直认为，天空是倒挂的弧形，无法贮存水，而龙就是雨水神的化身，把陆地上江河湖海的水输送至天庭，再以降水回馈人间。对这一认知最直接的实践，便是古代普遍存在、代代相传的祭龙祈雨传统。早在商代，就有筑土龙祈雨：“汤遭旱，作土龙以象龙，云从龙，故致雨也。”^④这一信仰在少数民族中也普遍存在。鄂伦春族认为，“雨是由于龙神下到池子里用龙鳞蘸水上天后才形成的”^⑤；赫哲族则认为，“雨是由龙把江水吸上去，装在鳞甲里。每片鳞甲能盛四十挑子水，哪方需要就到哪方去撒下”^⑥。在农耕社会，生产力低下，老百姓靠天吃饭，降雨关乎生计。而“祭祀龙王求雨”成为多民族的共同仪式，更说明龙作为雨水神的化身，已超越单一族群的信仰范畴，成为农耕社会共享的生存符号——因降雨直接关乎生计，祭龙祈雨从“信仰活动”转变为“生存实践”。

龙还被视为虹神的象征，这得到了文字与传说的双重印证。甲骨文中的“虹”字是象形字，笔画形状即为与龙、蛇相似的动物，“卜辞虹字象两头蛇龙之形”^⑦。这种文字上的关联，在民间传说中发展为“虹即龙化身”的叙事。傈僳族认为虹就是龙的化身。^⑧而虹到民间饮水的传说，在历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。例如，汉代就有这一传说的明确论述，“是时天雨，虹下属宫中，饮井水，井水竭”^⑨；魏晋南北朝时期，“后魏孝明帝正光二年，夏六月，首阳

① 何星亮：《龙：图腾——神》，《民族研究》1993年第2期。

② [宋]王溥：《唐会要》卷二二《龙池坛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433—434页。

③ [清]郝懿行：《山海经笺疏》，栾保群点校，中华书局2021年版，第225页。

④ [汉]刘安：《淮南子集释》，何宁整理，中华书局1998年版，第342页。

⑤ 秋浦：《鄂伦春社会的发展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159页。

⑥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：《黑龙江省饶河县西林子乡四排村赫哲族情况（赫哲族调查材料之二）》，内部铅印本1958年版，第95页。

⑦ 陈梦家：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，第243页。

⑧ 《民族问题五种丛书》云南省编辑委员会：《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71页。

⑨ [宋]吴文英：《梦窗词集校笺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1400页。

山中，有晚虹下饮于溪泉”^①，更点明了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具体细节；郭沫若也曾提及“吾蜀乡人至今犹有虹有首饮水之说”^②。可见虹饮水这一传说的传承与延续。

龙亦被视为海神的象征。如清雍正二年（1724）八月，朝廷下诏册封四海龙神，并进行祭拜活动，“又加四海龙神封号，东海曰显仁，南海曰昭明，西海曰正恒，北海曰崇礼，均遣官赍送祭文香帛，令地方官致祭”^③。古代中央王朝通过官方册封与祭拜的形式尊崇四海龙神，明确并尊崇“龙”作为海神的象征地位。

除了将龙视为人类祖先及神的化身，还有民众将一些日常事物视为龙，比如火焰、树木、老虎、螃蟹、鳄鱼等。^④龙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，在各民族文化中都代表着吉祥、权威、力量等正面的价值观念。正是这种对龙正面价值观念的共通性，使得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，能够以龙文化为桥梁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。

三、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创图腾崇拜

在古代，各民族之间通过贸易、战争、迁徙等方式频繁互动，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中不断碰撞、相互吸收与融合。中原地区的龙文化逐渐向周边传播，同时吸纳了各民族的图腾元素，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龙图腾文化。目前，龙文化相关遗迹遍布全国，充分表明龙是各地域、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尊奉的图腾象征。

（一）龙是各民族共创的图腾

龙的形象融合了多种自然动物特征与部落符号元素，既象征着对自然力量的尊崇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寄托着对部落繁荣与吉祥如意的祈愿。考古发现的大量含龙形象的器物，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，且形态各异，充分证明了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图腾。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就已出现具有龙纹的实物。距今约 8000 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掘出由红褐色石块堆摆而成的“龙形堆塑”。此龙体型庞大，身长约 19.7 米，宽约 1.8 ~ 2 米，整体造型呈昂首，张口弯身，背部拱起，尾部若隐若现，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。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龙形象的原始形态。同时，在龙形堆塑的南侧、紧靠龙腹部下方发现有墓地及祭祀坑，表明早在当时人类已经开始用龙的形态来表达某种宗教意识。这也是中华民族龙意识形成的重要来源。^⑤距今约 7000 年的仰韶文化文物上就有鱼龙、蛇龙、鳄龙等不同样式的龙纹，^⑥反映出早期龙形象的多元雏形。距今约 6000 年的湖北黄梅县焦墩遗址中，发现了一批卵石摆塑遗迹，其中“龙全长 4.46（米）、高 2.28（米）、宽 0.3 ~ 0.65 米，昂首直身，曲颈卷尾，背部有三鳍，腹下伸三足，长颈曲折弯卷，独角上扬，恰似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”^⑦，在龙的四周还摆放了龟、鱼、蛇等动物，体现了龙的尊贵地位。^⑧这是长江流域早期龙文化的重要实物。距今约 4000 年的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透雕龙形玉佩，长

① [宋]李昉等：《太平广记》，中华书局 1961 版，第 3173 页。

② 郭沫若：《卜辞通纂》，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，第 388—389 页。

③ 《清朝通典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，第 2266 页。

④ 杨正权：《论西南民族龙文化》，《云南学术探索》1997 年第 4 期。

⑤ 参见中国考古学会：《中国考古学年鉴（1995）》，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114—115 页。

⑥ 袁广阔：《龙图腾：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、认同与传承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20 年 12 月 2 日。

⑦ 中国考古学会：《中国考古学年鉴（1994）》，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228 页。

⑧ 何晓芳、张立夫：《中华民族共享符号研究：“龙”传承的历史叙事》，《民族论坛》2025 年第 1 期。

9.1 厘米，宽 5.1 厘米，龙体蟠曲，头顶及后部为高耸的角状装饰。^①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距今也有 4000 年左右，出土的几件彩绘龙纹陶盘，龙纹呈蛇形，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。^② 距今约 3800 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，也出土了不少龙形器物。如在 V 区 M4 中出土的 3 件绿松石铜牌饰，其“凸面（正面）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镶嵌组成变形‘龙’纹”^③。2002 年，二里头遗址又发掘出一件绿松石龙形器，据考古记载：“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，由肩部至髌骨处。龙头朝西北，尾向东南……全器由 2000 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……绿松石龙为巨头，蜷尾，龙身起伏有致，色彩绚丽。……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，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卷曲弧线，似表现龙须或鬃的形象……龙身略呈波状起伏，中部出脊线，外缘立面粘嵌一排绿松石片。……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，尾尖内蜷，跃然欲生。”^④ 可见，中原地区对龙形象的创造已颇具美感。以上体现出东北、中原、长江流域等不同地域均出土了龙形象器物，有力证实了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图腾。距今 2000 多年的云南保山市昌宁大甸山古墓葬属春秋战国时期，经考古发现，出土的铜饰上“面饰八组涡纹”^⑤。“涡纹”似水，被认为是早期蛇形龙纹的表现形态，体现了西南地区先民对龙形象的早期塑造。

综上所述，关于龙的遗迹出现于今辽宁、湖北、湖南、云南、河南等地，遍布全国。因此，可以说龙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各民族先民们共同创造的图腾象征。

（二）龙是帝王的象征

古时人们认为龙具有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，因而赋予其神圣地位。基于此，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，往往将出身神秘化，自称为“真龙天子”，这进一步巩固了龙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。龙与帝王崇拜紧密结合，使龙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。在中国古代，帝王往往被视为龙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有龙的影子。皇帝的容貌称“龙颜”，身体称“龙体”，继位、登基称“龙飞”，去世称“龙驭宾天”等。龙被视为帝王的象征。

自秦开始，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常将自己的诞生神秘化，声称自己与龙有关，借助龙的尊贵和威势树立自己的权威。秦始皇就被称为“祖龙”^⑥，而汉代帝王登基后也自称为“真龙天子”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里记载了汉高祖是“龙子”的故事：“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”^⑦ 帝王将自己描述成龙种或者真龙天子，老百姓也深信不疑，认为帝王就是龙的化身。

年号是古代帝王为记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，其中与龙有关的达 14 个。^⑧ 部分年号曾被多位帝王使用，比如汉宣帝刘询、东吴孙权均用过“黄龙”作为年号，魏明帝曹叡、后赵义阳王石鉴、后燕昌黎王兰汗均以“青龙”为年号。有些年号较为知名，如武则天曾使用的

① 郑元日、封剑平：《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群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0 年第 12 期。

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：《1978—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83 年第 1 期。

③ 袁广阔：《论二里头文化龙崇拜及其对夏商文化分界的意义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22 年第 6 期。

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：《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》，《考古》2005 年第 7 期。

⑤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：《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2016 年第 1 期。

⑥ 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，第 259 页。

⑦ 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，第 341 页。

⑧ 14 个与龙有关的年号包括：黄龙、青龙、白龙、神龙、景龙、见龙、龙兴、龙飞、龙昇、龙启、龙朔、龙凤、龙纪、龙德。参见方诗铭：《中国历史纪年表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，第 157—164 页。

“神龙”，史载“神龙元年春正月，大赦，改元”^①。另外，“龙兴”作为年号，因寓意王朝的兴起，亦颇受帝王青睐。最早使用该年号的为东汉公孙述，他于建武元年（25）四月自立为天子，“建元曰龙兴元年”^②。唐元和五年（810），唐南诏王第五世王劝龙晟改元“龙兴”。云南大理第十七世国王段正兴继承王位后，也曾改年号为“龙兴”^③。通过与“龙”相关年号的普遍使用，可见帝王与“龙”的紧密关联。

由此可见，不管是汉族皇帝，还是少数民族皇帝，都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与龙相关联，或以龙为自己的化身，或使用与龙相关的器物，或采用含“龙”字的年号。龙因此成为帝王的象征，并超越单纯的权力标志范畴，演变成为一种独特而深厚的文化符号，深深烙印在中国古代的皇权文化之中。此外，龙还被纳入王朝正统性的符号体系，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云“夏得木德，青龙止于郊”^④，以龙的出现附会王朝运势，进一步深化了龙的象征意义。

龙图腾作为各民族共创的崇拜对象，本质上体现了文化的共通性。它不仅是对某种动物形象的崇拜，更代表着各民族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皇权的推崇。龙图腾所蕴含的力量和权威的象征意义，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，在各民族文化中获得广泛认同和传承，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纽带，为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文化支撑。

四、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享风俗习惯

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深度融入各民族的共享风俗习惯，在节日庆典、祭祀祈福、建筑装饰、服饰艺术及命名等多个方面均留下了鲜明印记，成为联结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。

（一）节日庆典中的龙文化

1. 春节舞龙

春节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节日，舞龙作为其核心庆祝活动之一，广泛流行于各个民族。在汉族春节庆祝活动中，舞龙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民众舞动色彩斑斓的龙灯，伴随着锣鼓声穿梭于大街小巷，祈求新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国泰民安，既烘托了节日的喜庆氛围，也体现了人们对龙的崇拜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许多民族地区同样有着舞龙的习俗。例如，壮族在春节期间举行盛大的舞龙活动，男女老少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参与其中。苗族的春节舞龙也别具特色，舞龙队伍巡游村寨，所到之处，人们欢声笑语，共同庆祝节日，祈求幸福安康。各族同胞均通过舞龙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传统风俗的传承。

2. 端午赛龙舟

赛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活动，其起源与纪念屈原相关，更植根于各族人民对龙的共同崇拜。古代先民为了祈求龙神保佑，将船只做成龙形并举行祭祀活动，赛龙舟逐渐发展为兼具竞技性与文化性的民俗活动。如今，赛龙舟活动不仅是汉族的传统习俗，更是多民族共享的文化仪式，不仅是力量与协作的比拼，更成为各民族共庆佳节、增进情感联结的重要载体。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，最早也与龙崇拜有关。先民将粽子投入水中，意在供奉蛟龙以求

① [后晋]刘昫等：《旧唐书》卷六《则天皇后本纪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132页。

② [南朝宋]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一三《隗嚣公孙述列传》，[唐]李贤等注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535页。

③ 《辞海》（中国古代史分册）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32页。

④ 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二八《封禅书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366页。

平安。闻一多认为，农历五月初五本是古代吴越地区“龙”图腾部落的祭祀日，当地百姓曾有断发文身“以像龙子”的习俗；时至今日，各地流传的用五彩丝缠绕手腕、脚腕的民间风俗，便是这一古老纹身习俗的演变。这进一步印证了龙文化对端午习俗的深层影响。

3. 二月二龙抬头

谚语曰：“二月二，龙抬头。”农历二月初二也被称为“龙抬头节”，又称“春龙节”“龙兴节”，是中华民族祭祀龙神的重要节日之一。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云：“二月初二日，焚香水畔以祭龙神。”^①人们常于此日理发，寓意“剃龙头”以迎祥瑞。这一节日既与龙作为“鳞虫之长”的象征想象有关，也与节气时序紧密契合。其时间邻近“惊蛰”“春分”，此时大地复苏、万物生长，民众借“龙抬头”的文化意象，祈求一年农事顺遂，有个好收成。

（二）祭祀祈福中的龙文化

1. 祭龙仪式

祭龙是许多民族共有的祈福仪式，以祈求龙神庇佑。一些民族会在特定时日，虔诚地向龙神献上猪、羊、水果等丰盛的祭品，以庄重的仪式祭祀龙王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，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各民族祭龙仪式各具特色。例如，哈尼族把每年农历二月初二确立为祭龙日。这一天，全村人身着盛装，前往龙树林（被视为龙的栖息地）举行隆重的祭龙仪式，由专人主持祭祀流程，人们敬献祭品、焚香祷告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祈求龙神保佑村寨平安、五谷丰登。祭龙节也是傣族人民的重要传统节日，民众前往寺庙中祭拜龙神，在袅袅香烟中虔诚祈求家人平安健康、生活顺遂。这一习俗不仅传承了民族文化，也强化了对龙的信仰认同。湘西苗族的“接龙”风俗亦很有代表性，通常在遇到大丰收、添丁等大喜事时举行（一般在农历二月或十月），由两位巫师任“接龙师”，主要流程包括设龙座、祭雷神、敬龙神、安龙位等，“设龙座于堂屋正中，打开大门，铺晒簾，围稻草圈，圈里便是龙座。堂屋里摆小方桌，屋外摆大方桌。龙师从屋外向屋内抛一匹布，从大方桌拖到小方桌，再扎个稻草龙头或竹篾纸龙头，插在大方桌前，长长的布条象征一条大龙”^②；敬龙神过程中，接龙师朗诵敬龙神词，并带领民众到水井边引龙，由村民装扮的“龙公”“龙母”用瓦罐汲一罐清泉水，是为“龙水”，随后接龙师率领引龙队回屋跳接龙舞；最后进行“安龙位”，将取回的“龙水”倒入碗中，掺入烧酒、朱砂和银子，上盖石板，至此全套流程结束。总之，各民族不同的祭龙仪式丰富多彩、各具特色，但都体现出龙文化的深刻烙印。

2. 祈雨仪式

在传统农耕社会中，雨水对农作物生长至关重要。因此，许多民族都形成了以祭祀龙为核心的祈雨习俗。特别是遇到干旱少雨时，祈雨活动会更加隆重。在祈雨仪式上，各族同胞都会载歌载舞，祈求龙王怜悯，早日降下甘霖。汉族的祈雨仪式中，人们会抬着龙王像，挨家挨户祈求降雨。彝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祭龙祈雨仪式，如彝族在干旱时会在龙潭边摆上祭品，由毕摩（彝族文化传承人）主持祭祀仪式、念诵祭文，祈求龙神降雨，滋润大地。这类祈雨仪式体现了各民族对自然的依赖和对龙的敬畏，通过共同的龙文化活动，各

^① 胡朴安：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（下编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版，第 283 页。

^② 过伟：《中国少数民族龙文化论》，《广西民族研究》2000 年第 4 期。

民族在祈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。

由此可见，龙文化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祭祀祈福活动中，虽然仪式各具特色，但核心都是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在农耕社会背景下，这些活动既体现了各民族对龙的共同信仰与对自然的依赖，也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凝聚了民族情感，强化了生存发展中的文化联结。

（三）建筑装饰中的龙文化

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，龙的形象比比皆是。在中国古代建造的宫殿、庙宇、园林等建筑中，常常可以看到精美的龙雕龙绘。如故宫作为明清皇家宫殿，其建筑装饰中龙的形象无处不在。太和殿前的九龙壁上，九条龙形态各异、栩栩如生，或升腾于云雾，或潜伏于波涛，色彩绚丽，气势磅礴，既彰显了皇家威严和尊贵，也表现了龙文化的象征力量。庙宇中的龙雕龙绘则更多地体现了宗教信仰和吉祥如意，如龙王庙中的龙雕，象征着对龙的崇拜和对风调雨顺的祈求。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建筑中，也同样有龙的身影。侗族的鼓楼、风雨桥等建筑上通常有龙的雕刻和绘画，其造型独特，线条流畅，色彩鲜艳，将龙文化与侗族建筑特色相结合，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白族传统民居的门窗、梁柱上，也常以龙纹图案为装饰，寓意吉祥如意、幸福安康。这些龙雕龙绘的装饰不仅是建筑美学的体现，更是各民族文化传承和表达的重要方式。此外，部分民族的传统建筑布局也融入龙的寓意，如苗族部分村寨会模仿龙的形状规划布局，道路蜿蜒曲折，房屋错落有致，寓意龙的生命力与活力，象征村寨的繁荣昌盛。这种建筑布局与龙的寓意相结合，体现了苗族人民对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运用。可见，在中国传统建筑中，龙的形象与寓意广泛存在于多类建筑及多个民族的文化表达中。龙元素不仅以雕刻、绘画、建筑布局等多样形式呈现，更成为各民族传承文化、寄托美好愿景的重要载体，共同体现了龙文化在建筑装饰领域的深远影响。

（四）服饰艺术中的龙文化

各民族的服饰中也常常出现龙的元素。其中，皇帝所穿的龙袍最具代表性，是皇权的象征。虽然在现代社会龙袍已不再具有这一象征意义，但龙的形象依然深受喜爱。在一些传统节日或特殊场合，人们仍会制作和穿着带有龙图案的服饰，以表达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中，也常出现龙的图案。如苗族刺绣中龙的形象就十分常见，人们以细腻针法、鲜艳色彩将龙的形象生动地呈现于服饰之上。这些龙纹刺绣不仅具有装饰作用，还承载着苗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。方南苗族服饰中大多有苗龙的元素，有“牛龙、鱼龙、蜈蚣龙、水龙、射龙、人头龙、鸡头龙、泥鳅龙、飞龙、虾龙、狮龙”^①等多种形态，突出体现了苗族对龙的多元想象。瑶族的银饰也常以龙为造型，工艺精湛，造型精美，不仅体现了瑶族银饰文化特色，也寄托了瑶族人民对龙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由此可见，在中国各民族服饰文化中，龙元素运用广泛，既发挥装饰作用，也成为各民族传承文化、寄托对美好生活追求与表达龙崇拜的重要载体，共同彰显了龙文化在服饰领域所体现的生命力与影响力。

（五）命名传统中的龙文化

在各民族文化中，龙常作为吉祥、权威的象征用于人名和地名。在人名方面，“龙”是常见字，如“小龙”“飞龙”“祥龙”等名字，既蕴含“望子成龙”的期许，寓意孩子能够像

^① 胡瑞波、董建辉、杜沂倩：《从符号学角度谈方南苗族服饰中苗龙的文化表达》，《贵州民族研究》2022年第1期。

龙一样有出息、有作为，也反映出龙文化对个体身份认同和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广泛影响。与龙相关的成语，如龙腾四海、车水马龙、乘龙快婿、见龙在田、人中之龙、龙飞凤舞、望子成龙、群龙无首等，均耳熟能详、深入人心，进一步印证了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在地名方面，龙文化的印记也同样显著。在侗族聚居地区，深潭被视为龙的栖息之所，因而常被称为“龙塘”“龙王滩”等。^①黎族生活的地方，如海南省东方市“鱼龙村”，也以龙命名。福建省龙岩市的得名，源于当地翠屏山的龙岩洞。该洞岩壁经千百年的沉积，形成似龙盘踞的龙形纹理，“龙岩”之名便由此而来。在各民族的命名文化中，龙作为吉祥、权威的象征是共通的文化内核，展现出鲜明的文化共性。

综上，龙文化已深度融入各民族共享风俗习惯，从节日仪式到日常细节，从精神信仰到物质载体，均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。各民族在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，也以多元实践共同参与龙文化的丰富与创新，最终使龙文化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，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财富，并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，为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。

五、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有价值观念

龙文化承载着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，包括团结统一、和谐共生、奋发进取、崇德向善、天下大同等，是各民族文化相通的生动体现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。

（一）团结统一

龙的形象本身就是多种动物形象的集合体，它融合了蛇身、鹿角、鱼鳞等多种动物的特征。这种多元融合的特性，正是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隐喻。在中国历史进程中，各民族通过迁徙、贸易、通婚等方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，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。如同龙的多元构成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也始终以“和合”为核心，各民族在文化互鉴中紧密团结，凝聚共识，形成命运共同体。面对外敌入侵、自然灾害等重大挑战时，各民族始终如龙的躯干与四肢紧密相连，以团结统一的力量共克时艰、携手共进，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。这种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念，既是龙文化所蕴含的重要精神内涵，也是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稳定、推动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石。

（二）和谐共生

在神话传说中，龙常常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相关联，被视为掌管自然的神灵。这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，以及“天人合一”的朴素智慧，暗合了各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。无论是农耕民族“顺天时，量地利”^②的耕作传统，还是游牧民族“逐水草而居”的生存智慧，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，都形成了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的传统观念。这与龙文化所倡导的和谐共生理念相契合。这一理念进一步延伸至族际关系，在龙文化的熏陶下，各民族以“和而不同”为交往准则，尊重彼此的语言文字、风俗习俗、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，通过族际通婚、节日共庆、贸易往来等方式打破隔阂，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和

^① 宋恩常：《中国少数民族宗教·初编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344 页。

^② [北魏]贾思勰：《齐民要术今释》卷一《种谷》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，第 44 页。

谐的社会环境。从历史上的“茶马古道”促进各民族互市交流与情感交融，到当前“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，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”^①，各民族在交往中增进理解，在交融中凝聚情感，最终形成了“多元一体”的中华民族格局，印证了龙文化“和谐共生”理念的现实生命力。

（三）奋发进取

神话传说中的龙能够腾云驾雾、呼风唤雨，战胜困难和邪恶势力，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和勇敢无畏的精神，传递出积极向上、奋发进取的价值追求，成为激励各族人民勇往直前、攻坚克难的精神符号。从古代各族先民开疆拓土、治理水患，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压迫、寻求民族解放，龙文化“奋发进取”的精神始终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旗帜。进入新时代，这一精神更成为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，各族同胞以“龙的昂扬姿态”奋勇前行，立足民族特色、紧跟时代步伐，通过发展特色产业、传承民族文化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。这一过程中，各民族既保留了自身特色，又以创新实践诠释了龙文化“奋发进取”的当代内涵，充分印证了这一价值观念对推动民族发展的持久赋能作用。重庆市铜梁区的探索，正是龙文化“奋发进取”精神当代转化的典型案例。当地深耕龙文化资源，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一方面，大力培育龙文化文创产业与主题文旅产业，将“铜梁龙”打造成地域文化金字招牌；另一方面，推动龙元素全面融入建筑、道路、商店、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，使龙文化随处可见。同时，高度重视龙文化非遗传承，推动“铜梁龙舞”“铜梁龙灯彩扎”分别列入首批、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其中，铜梁龙舞还多次亮相国庆庆典、北京奥运会开幕式、上海世博会、北京世园会等重要场合，并远赴美、英、法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，有效推动了中华龙文化走向世界。^②

（四）崇德向善

龙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吉祥、正义的象征，既寓意“祥瑞之兆”，也是“惩恶扬善”的化身，这种文化定位使其成为“崇德向善”价值观念的载体。龙文化强调“崇德向善”“以德立身”，倡导人们要心怀善念、乐于助人，这与中华民族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传统道德观念高度契合。各民族都重视道德教育，将崇德向善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传承下来，并转化为各族同胞的行动自觉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尊重长辈、关爱他人、诚实守信、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等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龙文化崇德向善的价值观念不断内化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，成为维系民族情感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，更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。

（五）天下大同

龙文化不仅凝聚着国内各民族的“向心力”，也是推动中外文明对话的“桥梁”，其核心指向“天下大同”的价值追求。在国内层面，龙早已成为增进各民族共同性、强化民族认同的标志性符号。清朝统治者将龙纹融入满汉服饰，客观上为这一符号成为更广泛接受的文化标识提供了条件。当代“龙的传人”叙事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。不论哪个民族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，都是龙的传人。“龙”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标识。可见，

^① 习近平：《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9月28日。

^② 参见王小波：《深入推动铜梁龙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》，《农民日报》2024年3月28日。

“龙的传人”叙事超越了单一民族身份，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大团结，增强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。在国际层面，龙文化还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媒介。如敦煌壁画中的“龙王礼佛”图像，既保留了中国传统龙的形态特征，又融入了佛教文化的宗教元素，展现了佛教东传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龙文化的有机融合，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。如今，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，也正通过影视、艺术、节庆等形式走向世界，既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，也为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。这种“向内凝聚、向外开放”的特性，正是龙文化“天下大同”理念的当代实践。

各民族对龙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，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深层共识。这些共有价值观念不仅是历史遗产，更是文化基因，既承载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共同记忆，也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，持续推动各民族在形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上，携手投身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。

六、结语

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，贯穿于各民族共建族源神话、共创图腾崇拜、共享风俗习惯、共有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，是各民族文化相通的重要体现。这种跨越地域和民族界限的广泛文化认同，不仅契合了各民族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，也印证了龙作为共同文化符号的核心价值。在历史传播中，龙文化经过不断丰富与发展，早已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。历史地看，龙文化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，是各民族血脉相连、情感相亲的重要文化见证。就现实意义而言，各民族共创共享龙文化的实践，生动诠释了“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”这一论断，而由龙文化为载体所体现的各民族文化相通，正是“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”。^①进入新时代，我们可依托龙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将其作为增强各民族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，持续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与创新发展的实践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厚文化力量。

（责编 唐萍）

^① 习近平：《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24年9月28日。